

# 从远古、古代和现代看当下对师德要求之体会

游晴林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511500

**摘要:** 礼乐文化的核心是秩序、规范和仪式化,早在八九千年前的河南漯河贾湖遗址,就出现了随葬组合龟甲、成套化鼎罐壶陶明器、一墓二笛随葬的现象,及以绿松石为主要材料的玉敛葬等埋葬习俗。此外,贾湖遗址出土骨笛的墓葬比其他墓葬随葬品丰富,且伴有龟甲和叉形骨器,显示出墓主人较高的身份和地位,他们有可能是巫师或身兼巫师的某种特殊人物。考古学家推测,骨笛不仅是一种乐器,而且还可能与龟甲和叉形器一样,作为施行巫术的法器,从而具有一定的神秘意义。说明贾湖遗址的乐器功能和用途可能并非单一,墓主人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使乐器包含一定的礼器性质和意义。礼乐文化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贾湖时期。

**关键词:** 师德; 统一; 平等; 合理

##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 Ethics from Ancient,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You Qinglin

Art and Design College of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11500

**Abstract:** The core of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is order, standardization, and ritualism. As early as 8000 to 9000 years ago at the Jiahu site in Luohe, Henan, there were burial customs such as the combination of turtle shells, complete sets of cauldrons, pots, and pottery utensils, one tomb with two flutes, and the use of turquoise as the main material for jade burial. In addition, the tombs with bone flutes unearthed from the Jiahu site have more abundant burial items than other tombs, accompanied by turtle shells and fork shaped bone tools, indicating the high status and status of the tomb owners, who may be wizards or some special figures who are also wizards. Archaeologists speculate that the bone flute is not only a musical instrument, but may also have a certain mysterious significance as a magical tool for practicing witchcraft, similar to the turtle shell and fork shaped instrument. The function and use of musical instruments at the Jiahu site may not be singular, as the special identity of the tomb owner imbues the instruments with certain ceremonial qualities and meanings. The origin of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Jiahu period.

**Keywords:** Teacher ethics; unified; Equality; reasonable

“礼莫大于敬天,仪莫大于郊祀”。祭坛作为祭祀天地、祈求庇佑的特有建筑,自新石器时代起,便已出现。而在辽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的三层圆祭坛,就是吉人从“扫地而祭焉”,“封土为坛而祭焉”,演化到“祭昊天于圆丘”的实证,它与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的方形祭坛,体现了红山先民天地崇拜的理念,对后世国家祭坛的建筑形制和祭祀礼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开物成务,纪天下序”,根据甘肃大地湾遗址的考古发掘,早在六千年前,渭河上游流域已出现了有中心和等级划分的聚落,产生了早期的社会治理方式。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和对远古各部族研究的进展,学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炎帝和黄帝是华夏族的代表,伏羲是共同尊奉的先祖。伏羲作为“有大智”的思考者和发明创造者,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象征,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伏羲“制嫁娶”,“立九部、设六佐、分部治理”,就是这一文明现象的具体反映。据先秦《世本》记载,伏羲氏发明陶埙、琴瑟等乐器,创作乐曲歌谣,将音乐带入人们的生活。创作了“立基”“扶来”、“驾辩”等最早的乐曲。

远古人类尚且知晓礼教在生活中对于塑造人们性格和思想的重要性,何况当代为人师表的教师这一主要施行“礼仪教化”为职能的群体了。《论语》中有“子曰:‘绘事后素。’”本意指礼于仁后,先有本质而后才有形式,放之于教育工作中也是一种新的启发。子夏问道: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问道:“‘轻盈的笑脸多美呀,黑白分明的眼睛多媚呀,好像在洁白的质地上画着美丽的图案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先有白色底子,然后在上面画画。”子夏说:“这么说礼仪是在有了仁德之心之后才产生的了?”孔子说:“能够发挥我的思想的是子夏啊!可以开始和你谈论《诗经》了。”

对于礼,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要依据礼的要求,不能违背、不能僭越、更不能丢弃。孔子从子夏的联想中受到启发,认识到礼和绘画的“后素”一样,能让一切讲究仁德,符合道义,能让一切焕发光彩。放在新时代教育价值观上,体现在既突出教育的本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相合一,注重教育

价值融合，既强调人才的全面发展，又必须突显教育的社会价值，强调了立德树人是排在新时代教育价值观的第一标准。

### 一、知行合一，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的关系统一。

王守仁在五百年前提出过“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想，“知”，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指人的道德实践。他否定在德育上知行脱节，“知而不行”，倡导把道德皆归于个体自觉行为；因为从德育上看，道德行为和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道德意识必然要表现为道德行为，不去自觉地履行，不能算真正的道德意识。只是空中楼阁，没有实际意义。王守仁指出了道德上的实践重要性，强调人要在事上磨练，“表里”与“言行”要一致。二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即道德意识有其自觉性，需在人的内在精神上寻求突破；王守仁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指在道德规范指导下发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之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活动乃是“良知”的完成。人心是根本，知而不行，知识再多也是无益的。这对我们的启发是，首先要做到思想和行动的一致，再做到言行一致，从业与敬业一致；教人和育人一致；术业和专攻一致等。

韩愈在《师说》中也有相关论述：“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sup>①</sup>这里既指出授业和解惑不等于传道—师德，也呼应了上文的知行合一的观点，即道德行为和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道德意识必然要表现为道德行为，不去自觉地履行，不能算真正的道德意识。“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sup>②</sup>“惑”可以说是说知识的疑惑，更可以指道德方面的疑惑，句读代指知识，韩愈把传道排在授业之前，即认为，知识只是次要的方面，如果小的方面学习，道德—大的方面反而放弃，即不能算真正明了传道—师德本质的真相的。诸如此类，近期如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博导张鹏性骚扰女生事件，早期如云南大学马家爵事件、西安音乐学院药家鑫撞人事件、清华刘海洋泼熊事件等，都很能说明道德面前不分师德和生德，德在识先的顺序必要性。教师应是“既教书，又教人”，那么自身没有修好道德就育不好人；学生是“既求知，又求惑（道德上的疑惑）”，如果自身没有解决好道德上的疑惑就不能成为真正有用之材，甚至会成为废材和有害之“材”。

### 二、不耻相师，教者与被教者关系合理化、平等化。

韩愈在一千年前作《师说》，敢于突破俗见，是从培养人才出发写就的一篇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流于俗的文章。这篇文章降低了身为入师的神秘性、权威性、把师生关系平等化、合理化，还连同打破了家法和师法之间的壁垒。“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sup>④</sup>

这里的道，就是做人的道德和良知。这和知识的多寡没有成正比的关系，而是和做人的道德直觉判断有关系。唐时的韩愈即初察到，社会才是真正的学校，生活才是真正的老师，在这里不分年长老幼，谁对社会和生活的道德判断正确和高尚，谁都可成为别人的老师。清代蔡世远在《古文雅正》中说“韩子得以弟子也，然诸人集中亦鲜推尊为师者，况其他乎？以此知唐时气习最重，故韩子痛切言之。唐学不及汉宋者，亦以此也。”<sup>⑤</sup>

再看《师说》中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与“士大夫之族‘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谄’、‘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sup>⑥</sup>，这句话含义类似现在的沟通学所强调的平等沟通（对等沟通），即人人平等，不应该有高低之分，但参与沟通时，人会因学历、职务、阅历、辈分等背景的不同而产生差别。传道授业本质上就是一种相互沟通，对话双方一定要保证对等，如同在企业中，企业总裁不可能和一个普通职员进行商务沟通一样，不能用强迫力和行政手段去进行。延伸到师德沟通中，如果单纯用行政手段和塑造模范标兵式的学习模式，同样也难以起到作用，因为普通人需要在对等条件下才能有自由空间履行道德学习动机和需求，单一树榜样学习的行政模式反而无法消除在道德标兵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鸿沟和所需要创造的自由、平等、主动的学习氛围，如将韩愈“道”的内涵等同于现在的“真理”来理解，那么就是：“谁掌握了真理，谁就是我的老师”，这是很合理的。即如同现流行的口号“向有真才实干的人学习”一样，也即韩愈所说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但是将儒家之道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教育之道罢了。如要求在师生、同学间及公民间，建立平等互助、团结友爱的人际关系；学生作为独立的社会个体，在人格上与教师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是一种朋友式的友好帮助的关系等，都无一不在明确这合理化、平等化的关系。

在陶行知的五大主张中，也包括了该观点。如教师要具备“孩子的心灵”，这样才能走进孩子的天地，发现他们潜在的创造力。教师若不肯向学生虚心请教，便不会知道他的环境、能力、需要，那么，教师就不能教导他。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教育者应“以学生之乐而乐，以学生之忧而忧。”<sup>⑦</sup>如果教师以己为尊，高高在上一味单纯灌输，则无法为学生创设这种平等条件下的沟通，亦无法从学生的表现中观察获得有价值的道德养分。而教学手法创新中的翻转课堂，不失为一种能够观察和挖掘学生表现长处的教学模式。

《师说》还提到“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苴弘、师襄、老聃。”<sup>⑧</sup>郯子是中国二十四孝中“鹿乳奉亲”的主人公，郯子为让父母双目复明，费尽周折伪装成鹿去鹿群中弄到野鹿乳，孔子认为郯子讲道德、施仁义、还能使郯地文化发达，民风淳厚，即在己之上，从而师之；“苴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忠诚周室，求仁得仁，以生命实践

“仁、义、礼、智、信”的儒文化核心价值，孔子以之为师。<sup>(9)</sup>；师襄是孔子的音乐老师，老聃则是周朝史官，道德经的创始人，孔子更悉心以之为师。“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sup>(10)</sup>即非常明确指出老师和学生的平等沟通、和角色反转关系。他启发要求老师之间、师生之间应该互相挖掘闪光点，互相为师，学生因为是教学活动最近的直观者，能知悉教师教学时优劣表现，故在听课除了学习固定的知识技能外，还应建议其及时向老师反馈其在师德上的优点和劣势；教师则要留意学生在课堂内外中值得学习的地方，并将其总结提炼推广；教师在教学相听课时，亦需留意并总结提炼被听对象在教学中表现，尤其在师德师风中能称道之处。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有人有某一方面的闪光点，他在这一点上就可以成为别人学习效仿的对象。给了我们对于包涵于道德中的师德更加宽泛和博大的理解维度。

陶行知主张教学做合一。即认定在生活中教法、学法、做法是不可分割的。“行是知之始”，在劳力上劳心，陶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即主张手脑并用；“以教人者教己”，即主张教学相长；即知即传，则是主张随学随教，进一步体现出了对知行合一观点的实践应用。<sup>(3)</sup>其对新教育的功能阐述更好地解释了知行合一和不耻相师的主张：一是改良个人天性，将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得到真正的统一；二是养成团队合作的好习惯，即“不耻相师”；三是传承优秀的文化，继承完善古人关于道德规范的合理理念和价值积累；四是成就教师自己的事业，让教师自己感受到一辈子从事教育事业是一件至高无上的事情，愿意沉下心来将这件事情做好。其实敬业精神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各行各业对本职工作的专注认可、追求卓越之精神，更是一种发自业者内心情感上的深沉眷恋；表现为从行为上愿意为本职工作尽职尽责；能跃升为一种自己力所能及、臻于善美境界的内在品质和成就。它是一个人在从业过程中所追求的在职业情感、职业行为和职业结果等三方面的完美统一。<sup>(11)</sup>朱熹《论语集注》中所说的：“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

<sup>(12)</sup>。即说我们应当将做人所应该遵循的各种原则和规范内化于心，并且持之以恒地保持下去。许慎所讲的：“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sup>(13)</sup>意为，凡是道德的行为，它一定是有益于他人，使他人有所“得”。且道德行为主体，也能够在道德追求完善中达到最大的人生价值实现和满足感，达到已有所“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和“得”是相通的。而在道德实践时、要善于和别人“不耻相师”，平等、合理地相互补充。师德乃是在知行合一基础上所达到的道德修养，个人在道德学习与实践自我锻炼、革新，在合理、平等自由的前提条件下，达到更高一级的道德水平和境界，即是教师主体践履自身道德活动的理想终点和满意成果。实际上五破五立”也正是要克服短视思想，建立一种平等、科学地履行职责的体制机制，将立德树人、潜心教学、全心育人的的落实机制建立起来，并注重以德和能为评判导向的用人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师德和礼一样，是一种“绚”，也要在具备一定要求的“素”的基础上才得以恰当地施展、发挥。”即绘事后（于）素（色）。“礼后乎”即礼是产生在仁（德）之后，仁（德）的礼的前提，礼的本质是仁（德），所以才有“礼后乎”。即先求仁（质）后（于）礼。

#### 引文：

- [1] (1)(2)(4)(6)(8)(9)(10)引自韩愈《师说》；
- [2] (3)(7) (11) 引自《陶行知教育思想理念——一个理论，三大原理，四种精神，五大主张》；[https://www.sohu.com/a/332255540\\_498299](https://www.sohu.com/a/332255540_498299)
- [3] (5)引自清代蔡世远《古文雅正》；
- [4] (9) 引自：<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AF%E5%AD%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C%E5%BC%98/486353?fr=Aladdin>
- [5] (12) 引自朱熹《论语集注》；
- [6] (13) 引自许慎《说文解字》。

